

地方人才培养与社会重建

——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长期轻忽的一个问题

宣朝庆

摘 要 以往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基本忽视了农村人才培养的议题,这主要是由研究者忽视了农村社会生存环境变迁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地方人才是联系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中介,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探索了培养农村新型人才的教育体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新农村建设积累了经验,值得当代新农村建设重视和借鉴。

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农村人才 晏阳初

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重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无论是政治上的“革命”与“改良”,经济上的“工业化”和“以农立国”,还是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与“文化本位”之争,左冲右突之中总是关涉到社会的走向;而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农村破产”、“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等讨论也莫不延续着相同的主题。近三十年来,学界从研究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开始,逐步在乡村建设的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模式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①。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在调查乡村社会情状,改良乡村生活,推广民众教育,鼓吹村治,改革县政,改进农业和农村生活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但是,对于该运动中的另一个重要经验,以农村青年为对象,培养地方人才,打造农村组织、科技、文化干部队伍,推动农村社会重建的创举,却在有意无意间被忽视了。出现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及其变迁缺乏系统认识和宏观把握,以至于无法断定该经验内含的特殊意义和时代主题,仅简

单地视之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技术、乡村建设的组织手段。为此,本文从农村社会变迁的脉络出发,考察了近代以来地方人才在农村社会的稀缺性,进而以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为个案,“深描”地方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制度创设。

一、地方人才:农村重建的基础与希望

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模式,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中所描述的,乡村是一个依靠长老(绅士)和传统来维持秩序的封闭、独立、地域性的社会,横暴权力受到儒家思想和土地利用边际的限制,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只铺设到县衙门,政府治理习惯于“无为而治”,乡村得以自立和“自治”。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乡村的土地与人口的搭配,结构性

^① 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

地制约着地域社会的繁荣与否。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从中央王国向世界体系成员的转型,农村社会的地域性、封闭式生存格局逐步破坏,不但被强行纳入世界生产分工体系,而且还要接受现代国家高度集权的制度与规则,在内外双重作用下农村社会失去了“天高皇帝远”的优越性,生存环境极端恶化,随之而来的乡村手工业崩溃、劳动力外流、金融短缺导致了农村经济萧条和社会解体。为了挽救农村,曾有学者寄希望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自然产生“城市救济农村”的连带效应,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城镇和新兴城市却有着天然的离农倾向。旧城镇是政治的堡垒而非工业的中心,它与乡村没有经济上互助的纽带。在通商口岸发轫的新型工商城市在生产、生活方面严重依赖海外市场,非但没有给本国农产品提供市场,还挤垮了农村手工业^①。

面对农村社会生存环境的危机,国人在宏观上曾提出几种思路:一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以政权为杠杆,改变农村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环境的态势,获得独立生存的机会;二是技术追赶,通过引进新型社会组织和先进科学技术,改进农村的社会组织和生产力;三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以生产关系变革谋求生产力的提高。这些思路是农村社会在内外压力下的自然反应。在1920~1930年代,国人就这些思路的可行性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和探索,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建设派是技术追赶派的代表。他们的乡村建设就是要帮助农民从传统封闭的、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向积极参与外部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达致改善生活质量的目标。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既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变革机遇。

在外部压力下,一个系统通过改变组织形态重新确定发展走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就一个社会系统而言,这种需求的实现却是有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生产出各类人才,以便在多种发展路向中做出选择、应对挑战。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需要的是与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打交道的外向型人才。相比较而言,传统农村社会的领袖人物及人才大多来自士绅地主阶级,由他们作为中间人与村庄以外的世界打交道,但这个游离于生产组织之外的阶级近代以来已经丧失了领导农村社

会的活力。正如陶希圣所观察到的,“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这个身分阶级已陷于破坏及紊乱时期”,“一部分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以图存,一部分却沦入痛苦民众之中,失业失学,渐消失其士大夫阶级的特性”^②。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除了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依靠西式教育体制进入城市,移向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界别,大部分则或充当兵勇,流入会党,或沦为“孔乙己”一样的失业者^③。农村中失业失学的“孔乙己”们既然都成了苦力们取笑的对象,哪里还能担当起领导农村的责任?此后,随着保甲制度的推行,农村精英阶层趋向流氓化,土豪劣绅担任村长、保长,根本不可能领导农村社区转型。

人才缺失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建设最大的障碍。因此,李景汉在定县社会调查后疾呼:“乡间人民知识简单,非有才德兼全的好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不能举办什么规模较大的事业。可是显然的理由,有才干的人大半不肯到乡间服务,而农村中优秀分子又都往城市跑。这与改进农村事业大有关系。如何培养乡村领袖,及留住乡村原有的人材,且使有用的人愿来乡间做事,是眼下极须注意研究的问题。”^④对于乡土中国而言,社会转型造成了大批地方人才的流失,在其需要现代化的时候却没有为它的更生、重建准备好人力基础。这一严重的问题和土地制度、外部环境等结构性条件一同造成了农村在1920~1940年代的重重危机。此时,乡村建设专家、社会学家杨开道前瞻性地指出:“中国农村假使没有一班平民的领袖,‘到田间去’实际工作一番,恐怕二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还是不会翻身的。农村领袖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农村领袖的需要,是何等切迫。”^⑤为了应对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乡村社会必须走出一条地方人才培养之路。自此,改革教育体制,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呼声日益高涨。晏阳初等人结合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61~72、105~127页。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6、42页。

③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④ 李景汉:《住在农村从事社会调查所得的印象》,《社会学界》1930年第4卷第4期。

⑤ 杨开道:《农村领袖》自序,世界书局1930年版。

乡村建设实践,在这个方面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超越士绅:为地方培养本地平民人才

晏阳初的人才培养计划是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从乡村平民教育转轨为乡村建设实验后开始的。当时,各种社团组织风起云涌,除经济合作组织外,息讼会、戒赌会、互助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逐步取代庙会、鼓会、香会等旧式的农村组织,成为农民参与社区管理、接触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新型社团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以负起组织、领导、协调的责任,而传统士绅为了保持身份和格调,宁愿在旧式组织中担当领袖,也不愿直接参与新型社团的运作,能提供场地、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已经算是高风亮节了,更多的则是挑剔、阻碍新型社团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合作项目都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骨干力量。由于仅受过平民教育的简单培训,同学会成员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办事能力不高、工作作风粗暴等问题,以至于被某些对乡村建设实验抱有兴趣的人士批评为:“同学会良莠不齐,大部分无业流氓(因为有业者无暇与平教会去周旋),而所受的教育,又系浮的,夸张的,其习性遂变作骄傲放纵的气象……于是同学会干涉村政、争权夺利,恶劣分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①。显然,干部素质不高已经造成了定县民众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赞成乡村建设的人士提议,这些青年有较强的组织性和活动能力,具有奉献、牺牲精神,应该注意在教育、政治、经济上给他们出路^②。考虑到人才素质已成为影响乡村建设实验的重大问题,晏阳初、傅葆琛等人决定探索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新型农村社区人才,解决干部素质问题。

乡村建设者们认为,历史上农村人才队伍主要出自绅土地主阶层,乡村建设的人才队伍培养则必须以平民青年为基干。晏阳初指出,“农村中的青年农民即是推动乡村工作的中心力量”^③,农村建设要成功,必须寄希望于培养农村青年,“今日农村运动的主要目标,要特别注重在农村的青年男女”^④。为了适应乡村建设的新要求,对这些青年要实行新式教育。经过培养,这些青年才俊应该具备三方面的

素质,“一是要有专门学识,二是要有创造能力,三是要有应世手腕”^⑤。“应世”其实是开放时代的村庄所需人才的基本要求,既表现在人际交往中熟悉社交规则和社会规范,也表现在知识体系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上。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定县不仅设立高级平民学校,以业余短期培训的方式培养乡村建设人才,还放远眼光,探索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在培养农村人才方面的创新。利用大学培养农村人才,这一主张刚刚提出就受到广泛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大学生作为精英人才,总量不过三万余人,大多数学生修文、法、理、医、工科,农科人数极少,他们毕业后大多希望留在城市工作;即便少量农科学生回到农村,也缺乏实践动手能力,缺少深入乡村普及农业科学的素养和精神。但是,晏阳初则指出:“农村运动是伟大的,必须以大学作基础,方能稳固。……有了大学源源不绝的培养农建人材,这运动才会发扬广大。”^⑥时任“平教总会”乡村教育部主任的傅葆琛也乐观地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利用大学教育体系培养农村人才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那些出身乡村的学生,由于家族及乡里观念的关系,有回到乡村工作,报效家乡的梦想。大学可适应这个需求,给予适当训练,使他们胜任乡村社会改革事业。他还呼吁教育界注意,在急需的农村人才中,有一部分必须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这包括教育人才、社会服务人才、体育及卫生人才、农业技术人才等。为此,大学教育要改变近代以来大学设在城市,不利于学生认识农村、献身农村的状况,靠近农村配置资源,把培养农村专门人才的学校设在农村,还应该适应要求,添设各种乡村科目,建立起适合乡村建设的大学课程体系。

傅葆琛详细规划了十二类主要科目,包括(1)乡村教育科目:乡村教育概论、乡村学校行政、乡村学

① 李明镜:《平教会与定县》,《独立评论》1933年第79号。

② 衡哲:《定县农村中见到的平教事业》,《独立评论》1932年第51号。

③ 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④ 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第5页。

⑤ 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⑥ 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第168页。

校辅导、乡村小学课程、乡村小学管理、乡村小学各科教学法、乡村教师及其工作、乡村学校调查、乡村民众教育实施法；(2)乡村社会学科目：乡村社会学概论、乡村社会组织、乡村家庭问题、乡村社会心理学、乡村社会调查、乡村娱乐问题；(3)乡村文学科目：乡村文学史、乡村诗歌、农谚农谣、农民应用文件；(4)乡村史地科目：乡村文化史、农业史、乡村名人传记、农业地理；(5)乡村政治经济科目：乡村公民学、村治学、乡村经济学；(6)乡村数学科目：乡村簿记学、农田测量学；(7)乡村理化科目：农业化学、乡村食物及养料的分析、乡村实用物理学；(8)乡村体育及卫生科目：乡村公共卫生学、乡村家庭卫生学、乡村家庭看护学、乡民健身法、乡村儿童游戏、乡村童子军之组织；(9)乡村生物科目：农村自然研究、有毒植物研究、益鸟害鸟研究、农村动物学、农业昆虫学；(10)乡村工程科目：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学、农田机械学、乡村建筑学；(11)乡村家政科目：乡村家庭管理、乡村家庭烹饪、乡村婴儿养育、乡村家庭工艺；(12)农业科目：农业概论、农场管理、作物学、土壤学、肥料学、园艺学、森林学、畜产学、家禽学、气象学、兽医学、养蜂学、养蚕学、农作物病害学、农产制造学、合作组织等^①。这十二类科目代表着农村前所未闻的知识体系，大致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农村社会的需要，不仅与当时流行的都市导向的学校教育大相径庭，更与经史子集的教育传统相揖别。

三、创新培养体系：从高级实验平民学校到私立乡村建设学院

从1920～1940年代，平教会的乡村建设事业持续了约二十年，在河北定县、湖南衡山、广西、江西、四川等地设立实验基地时，均配套相关教育设施，实施农村人才培养方案，摸索出了一套教育培训体系。其中，如下几方面较有代表性：

1. 开办高级实验平民学校。

农村人才培养计划是从很低级的水平开始的，最初的工作由定县高级实验平民学校承担。高级实验平民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执行建设计划的村长、同学会会长，学员主要来自初级平民学校已经毕业的学生和同学会的干部。课程分为社会和政治（讲中国政体）、经济学（合作社）、农学和农村卫生学四种，

对农村所需知识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高级实验平民学校的教学周期是四个月，每日授课两小时。据统计，1933年定县设有高级实验平民学校40所43个班（男生40个班，女生3个班），男生2406人，女生163人^②。

2. 开办湖南国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乡村师范教育是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家为了改造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而进行的一场教育实验，在学生培养方面注重农村社会的适应性，希望能够以乡村教师和乡村学校为中心完成农村社会重建。陶行知领导下的晓庄师范学校是著名的典范。晏阳初也希望能够以此来培养农村社会建设所需人才，1936年在湖南衡山实验县开办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该校的基本目标是培训相当数量的乡村教师人才，兼备教育者和社会建设辅导者的才能，协助地方政府，或领导人民，办理关于调查、自卫、改良农业、促进自治等事业^③。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与衡山实验县计划中的乡村工作密切配合，包括社会调查、军事教育、民众教育、小学教育、农业教育、乡村建设六大中心学程，每一学程占时一个学期，共三年修完。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课堂学习与实习相结合，学生在第二学期即到本县乡村改造示范区工作，第二学年到全县去实习。该校在三年发展中培养学生约四百人。

3. 创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

平教会为了培养农村建设干部人才，极希望得到大学的智力支持，在创办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之前，曾寻求与大学合作培养乡建人才。当然，这项合作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改变大学教育不重视农村问题的倾向，培养大学生下乡服务的能力和兴趣^④。1936年4月，平教会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共同创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根据合作协议，相关高校以定县实验区为乡村建设工作的实验室，派遣学者参加定县工作，有关学系三四年级学

① 傅葆琛：《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中华印刷局1930年版，第91～109页。

② 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衡山师古乡社会概况调查》汪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1937年，第1页。

④ 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463页。

生必须在定县工作若干时间才可完成学业。这一举措使乡村建设极缺人才问题得以暂时解决^①。

此外,晏阳初等人还计划创办一所农村建设育才院^②,这是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教育体制的进一步结合,以正规的大学研究生教育培养农村建设高级人才。在创校之初,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每年各补助经费5万元^③。1936年农村建设育才院在河北定县开学,翌年三月各所研习生南下湖南衡山实习。不幸,河北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育才院未能继续办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总会移至湘赣川三省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愈发展,人才愈感缺乏,‘总会’高级人员奔走各地,时有照顾难周之苦;中级初级人员需要多且急迫,却无法觅得”^④。1940年,晏阳初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作为培养乡村改造人才的高等学府。学校设有农村教育、农业教育二科,招生对象是高中或高级师范学校、高级农业学校毕业并有一两年工作经验者。两年后,增设水利工程系、社会行政系(社会福利),扩大招生规模。1945年8月更名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进一步增设公共卫生系、地方政府系。

由于学院在教学原则与方针、教学管理等方面紧贴农村社会建设,与当时的大学教育体系判然两分,因此,当时的教育部只好允许其自订课程标准,实行本土化教学。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规定三年级学生必须在教授指导下参加实际工作。此外,学生在暑假由学校按计划分派到农村参加乡村工作。从1947年秋季始,学院进一步把实习划分为平时实习与集中实习两种,推行“即讲、即学、即习、即能”的教育模式,学生要按月和学期提交书面的实习报告^⑤。通过多年努力,这所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新农村建设学院不仅把学校建设在农村,而且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原野上。

4. 创办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

1939年傅葆琛出任华西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院院长,创立乡村教育系,后更名为乡村建设系。该系设立的目的是储备乡建人才,研究乡建学术,实验乡建方法,提倡乡建事业,编刊乡建读物,提供乡建成功经验。该系在学生培养上实行辅修制度,学生必须另选一个与乡建有密切关系的辅系学习,以培养学生既通晓乡建理论,又可从事一种专门的工作。除

课堂学习之外,学生要在各科教授指导下实习^⑥。

有人这样评价该系:“华大乡建系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各大学中最为特殊,即在中国与世界大学历史上亦无设置此系之前例。这一世界所无、历史未有、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华大乡建系,实具有充分的创造性。”“华大乡建系有一贯的理论与作风,将以弥补四五十年来大学教育彷徨无主之缺憾,实为今后大学教育开出一光辉灿烂之远景,它将使建设与教育合二为一,它将使乡村建设作为大学教育的广泛的内容,它将使大学生的研究实验工作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密切扣合起来,以求得社会的改造,文化的复兴。”^⑦

四、比较与讨论:乡村建设经验的普适性及意义

由短期培训、乡村师范教育、乡村建设专科学校到大学乡村建设系的设立,晏阳初等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孜孜以求地探索完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以期有效解决当时“知识分子下乡难”、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虽然受到战乱、政局等外在干扰,但他们仍然取得了部分成绩,培养出一支具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了解农民和农村基本问题,懂得使用现代民主议事程序的人才队伍,为当今的新农村建设留下了初始的、宝贵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不是封闭的,在现代教育体系之外自创一套,而是开放的,甚至相当依赖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创新性地运用现代教育方式,把农村人才培养与现代教育体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当今有志于农村人才培养者所不可忽视的。

这种历史经验自1950年代后获得了国际认同或仿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晏阳初因政见不合,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广他的农村社会改造经验,创

① 吴相湘:《现代史事论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58页。

② 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462页。

③ 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454、456页。

④ 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19页。

⑤ 吴相湘:《晏阳初传》,第375~376页。

⑥ 傅葆琛:《华大乡建系概况》,《华西乡建》创刊号,1947年1月。

⑦ 马秋帆:《〈华西乡建〉创刊旨趣》,《华西乡建》创刊号,1947年1月。

建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后改称晏氏乡村改造促进会),并在菲律宾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培养当地农村人才,开展乡村建设,使晏氏特色的乡村建设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不过,时过境迁,完整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始终无法恢复。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展开,韩国的新村运动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注意。新村运动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应对农村破产的范例。据笔者实地考察与研究,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晏阳初定县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定县实验不同的是,新村运动是政府推动的国家行动。运动之初,韩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培养农村人才的重要性,而是着眼于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提供物质帮助,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为此,韩国政府改进新农村建设方案,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员,成立新村指导者研修院,培训新村指导者^①。新村指导者培训计划把新型知识体系灌输给农村青年,增强了他们适应工业化社会、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使政府的资金投入发挥了最大效益,有效保障了政府支援开发项目的实施^②。但是,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相比,韩国只重视农村青年的短期培养,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干部教育培养体系,因此难以为农村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随着韩国经济的起飞,农村人才还是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而大量流向城市,后来农村建设效果不佳,与人才匮乏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从发展阶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经由社会的自发运动而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韩国、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同属于这一阶段。与这种趋势相适应,农村人才队伍的使命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领导力量,他们不只是农村与外界接触的中介,也是政府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执行者、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者。要适应这一形势,农村人才必须加快知识更新,掌握社会政经情势、国家政策、科技文化知识,具备民主意识,提高议事办事能力。但是,与新的历史任务相比,当前农村人才队伍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政府应借鉴中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农村人才培养的自觉意识,把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供应,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培养教育体制,制订专门计划,做好相关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工作。在农村人才选拔上,既要利用好大学教育资源,鼓

励、培养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也要抓好农村人才的培养工作,做到就地取材,使当地人才更好地为当地社会服务,扎实有效地推进社会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思想研究”(项目号:08BSH004)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项目号:10&ZD07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宣朝庆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① 关于这一名称,中国学者有多种译法,笔者核对原文,发现韩国在1980年代以前均使用“新村指导者”。

② 宣朝庆:《领导力建设:韩国新村指导者研修经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